

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

王家新 主编

数字人文

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

David M. Berry Anders Fagerjord

[英]大卫·M.贝里 [挪]安德斯·费格约德 著

王晓光 等译

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

王家新 主编

数字人文

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

David M. Berry Anders Fagerjord

[英]大卫·M.贝里 [挪]安德斯·费格约德 著

王晓光 等译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6-2018-283 号

Copyright © David M. Berry and Anders Fagerjord, 2017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政治出版社授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 (英) 大卫·M. 贝里 (David M. Berry), (挪) 安德斯·费格约德 (Anders Fagerjord) 著；王晓光等译.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6
(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
ISBN 978-7-5654-3506-5

I. 数… II. ①大… ②安… ③王… III. 数字技术-应用-人文科学-研究 IV. C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7367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217号 邮政编码 116025

网 址：<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数：175千字 印张：15.5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东威 责任校对：吉扬

封面设计：张智波 版式设计：钟福建

定价：52.00元

教学支持 售后服务 联系电话：(0411) 847103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11) 8471052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营销部：(0411) 84710711

“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编委会

主编

王家新

副主编

吕 炜

编委

王家新 王 蓉 史东辉 吕 炜 向 勇

高书生 张晓明 傅才武 魏鹏举

《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参与翻译的人员

按翻译章节顺序排列

王晓光 韦景竹 赵宇翔 范 炜 牛 力 裴 雷
周力虹 黄明玉

“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总序

王家新

谈文化艺术经济学，势必要从“文化”“艺术”“经济”这些范畴开始。一方面，文化与经济是并列关系下的永恒命题，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动力学、系统论的视角，可以解析两者共生、互动、一体化的进程。学者们沿着文化与经济这两个维度，在历史脉络中通过种种途径寻求两者融合发展的轨迹。而文化与艺术的关系则是整体与局部的统一，无论文化的定义如何纷繁复杂，艺术作为文化的子系统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文化艺术经济学可以描述为：一个以经济学为系统工具和参照系，以文化艺术活动为变量和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其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包括艺术在内的“大文化”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二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提供文化艺术产品、有效配置其资源的问题。两个核心问题衍生了不同的方法和路径，而这种交叉的、跨学科的研究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由此或许可以阐明这套译丛名为“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而非“文化经济学译丛”或“艺术经济学译丛”的缘由吧。

回望文化艺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上述两个核心问题的研究境遇迥异。从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到因发展不平衡而打破两者的藩篱，夹杂着政治

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论争，复苏于新经济地理学等为代表的经济学“文化转向”，繁荣于新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大文化”促进经济发展问题的视域里硕果累累，包括韦伯（Max Weber）关于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影响的研究，也包括诺思（Douglass C. North）对意识形态作为合约实施的变量影响经济发展的新锐观点。相比之下，对文化艺术产品生产及文化资源配置的研究则进展缓慢，滞后于日新月异的生产实践。

文化艺术是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资源。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艺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于其他要素，是以一种潜移默化而不是剧烈的方式，通常在深层次而不是浅层次上施加其巨大的影响力，因而未从实践和学理上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工业革命后，产业分工格局逐渐形成，自伏尔泰抛弃“桂冠诗人”的封号而投身出版业开始，文化艺术品也被纳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体系，如古典音乐被制成唱片、名家绘画被仿真复制并广泛传播，使高端精神消费从宫廷、贵族进入中产阶级乃至寻常百姓家。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文化创作、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众化趋势。新一代消费者大量使用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数字化媒体，不仅扩展了自身文化体验的范围和方式，而且从文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文化内容的主动创造者，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力、影响力在裂变式地扩大增强。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早已成为支柱性产业甚至是第一大产业，其对GDP和就业的贡献率不容小觑。我国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亦即其增加值超过GDP 5%，将成为最醒目的里程碑。原来习惯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台戏，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是满足新民生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文化艺术产业已经成为以创新

创意驱动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的任务是辨析事实、指向未来，经济学从未放弃对文化艺术这一“非经济因素”进行经济学分析和探索，这固然可以视作“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但追根溯源是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对理性和效率的偏好。早在庸俗经济学时期，萨伊（Jean Baptiste Say）、西斯蒙第（Sismondi）、李斯特（Friedrich List）就开始了对文化艺术生产问题的探索。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休谟（Hume）、杜尔哥（Turgot）、亚当·斯密（Adam Smith）都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艺问题进行了思考，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更是明确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内，这些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文化的使用价值如同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或缺，其交换价值又如钻石般弥足珍贵、不可复制，文化这种兼具钻石和水的特征的价值悖论现象，使得经济学无法使用既有标准化程式对其进行阐释，制约了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进展。真正标志着文化艺术经济学发展成为经济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是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鲍恩（William G. Bowen）发表了《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在此之后，文化艺术经济学以美国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众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讨论中，标志性的专著也随之出现，如1976年布劳格（Mark Blaug）编著了第一本文化艺术经济学读本，而索罗斯比（Charles David Throsby）和威瑟斯（Clen Withers）合写了第一本文化艺术经济学教科书《表演艺术经济学》。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西方学界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研究体系和框架，初步改变了文化艺术经济学理论滞后于实践、滞后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窘境。

文化艺术经济学在诞生伊始就肩负着鲜明的现实指向：在研究内容上，西方文化艺术经济学基本形成了以表演艺术经济、博物馆经济、电影经济、

视觉艺术经济、数字艺术经济为核心的基础框架；在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艺术经济学特殊本质和特征研究、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基于艺术行业特性的政府公共政策研究三个基本方向。其中，政策导向成为西方艺术经济学的突出特点，这是由于文化艺术生产和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趋重要，文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深度了解这些趋势的成因、把握其规律，对相关政策决策将大有裨益。经济学不仅为文化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框架和分析工具，还可以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政策建议，有利于文化政策在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找到结合点。事实上，近年来西方文化艺术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参与拟定政策者的推动，即英国学者贾斯汀·奥康纳（Justin O'Connor）所谓的“知识掮客”（knowledge intermediaries）。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撒切尔夫时期用文化与艺术促进城市复兴的政策导向，以及1997年工党赢得大选后提出的发展创意产业的议题。

然而，文化艺术经济学不是西方独有的命题，早在唐宋时期我国书画市场就已十分成熟，在米芾的《画史》《书史》《宝章待访录》等著作里可以看到历代皇室、豪门贵族及士大夫、寺观僧道乃至小工商业者经营、消费活动的记载。但是，我国现代文化艺术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要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事实上，1986年《国外社会科学文献》所译介的法国学者梅西隆（H.Mercillon）的“艺术经济学”一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艺术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文化艺术经济学也随之兴起，必将成为我国综合学术研究趋势下的一个重要新兴领域，并在现实语境中逐渐寻回自己理论探索的志向。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扩大内需，引导、挖掘人们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巨大需求，并把这些潜在在精神文化需求转化为有效的市场要

素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推进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央对推进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相关修订和调整，对文化艺术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迫切的现实需求。

正是为了满足新时期、新形势下拟定政策、指导实践、培养人才的需求，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秉持“高雅、高端、高瞻”的出版人文理念，引进西方文化艺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出了“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作为完善我国文化艺术经济学的重要知识参考和研究依据。编者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布伦伯格等大学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众多书籍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书，洽谈版权，协商翻译事项，全面启动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所选著作内容涵盖当代艺术品市场、文化政策、艺术金融、文化遗产等诸多领域，具体考察文化艺术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运作的实际情况，相关政策议题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一直以“集结全球智慧、凝聚智识人生”为己任，引进出版了1000多部国外财经类图书，这个书系是东财版财经译著的新成员，相信会对当代文化艺术经济学教育产生信息共享、知识溢出、协同创新效应，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时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任何事业都是这样，要传承，要开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自己的高度。或许这套译丛所选择的未必是文化艺术经济学中最好的、最重要的著作，但相信终有一天，会有更适合我国文化艺术实践、足以确立文化艺术经济学学科地位的代表性著作由此诞生。这正是我们编译这套译丛的初衷所在。

当今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應用已经成为驱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浪潮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兴数字技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个学科大类的科学研究均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单一学科可能不足以解决新的技术环境下出现的研究问题，这对学科交叉融合和理念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信息技术对人文科学研究资源类型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人文正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首先产生于语言学而后逐步扩展到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领域。数字人文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

国内数字人文研究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一批数字人文研究学者围绕数字人文思想的引入以及数字人文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做了持续努力和探索。

在这期间，学术期刊上发布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一大批数字人文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界对数字人文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当前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解决一些人文学科已经存在但是传统人文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如解决文学争议问题、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等；二是发现并研究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人文问题，如数字资本主义、数据主权、数据捐赠等；三是探究新型软件工具和平台在人文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教学中的应用及其影响。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丰富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数据来源，拓展了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域，这无疑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人文研究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但是从传统人文到数字人文，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数字人文研究者回答和解决。

首先是数字技术和专业鸿沟问题。人文学者缺乏必要的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数字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人文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人文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因此，计算系统及其实际应用应该由人文学者面向人文活动开展实施，这就需要不同学科学者之间加强沟通和交流，同时要求人文学者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并参与到资源库建设、知识表示等工作环节中。

其次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偏见问题。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取代一部分传统人文研究中由研究人员完成的工作，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景，也在进一步革新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要避免数字信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科学的文化

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二是要避免人文学者对技术本身的偏见。新兴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引起一些人文学者的不安，一些学者会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产生抗拒和怀疑，甚至认为数字技术正在侵犯人文学科，数字技术的使用是对人文原则的背叛。事实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已经成为人文学科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文学者只有正视数字技术并应用数字技术，才能有效地“与数字技术抗衡”。

最后是数字技术和理论发展问题。在数字人文项目中，数字技术很容易成为项目的中心，人文学者容易被数字技术所迷惑，使数字人文研究仅仅停留在工具层的贡献上。为此，数字人文需要进行一些批判性和反身性思考，加强其理论体系的建设，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此进一步发挥数字人文的潜力，为人文学科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面只是列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数字人文研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远多于此，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需要数字人文研究者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本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或许能为解决当下数字人文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带来启发和思考。

数字人文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并且处于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之中，各领域的学者对数字人文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数字人文研究的边界范畴也处于不断摸索之中，关于数字人文的优缺点及其给传统人文学科带来的影响也仍在激烈争论中，因此大卫·M.贝里和安德斯·费格约德两位学者采用了批判性的视角来展开本书的写作，使读者能够以一个更广泛的视角获取更全面的观点和思想，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围绕数字人文的历史沿革、重要研究实践、关键论点和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通过计算丰富人文学科的方法，探讨了文化批判如何改变数字人文学科，并讨论了数字人文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两位作者从历史视角和重要影响方面回顾了数字人文的发展阶段和里程碑事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数字技术、系统、编码、处理和项目向来都是数字人文关注的重点。鉴于计算已经成为人文研究的一项重要资源，计算思维作为一种新的计算思想批判性方法对于数字人文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数字素养的一部分，人文学者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编码能力，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搭建、批判、部署复杂的计算系统工作中。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知识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研究人员在知识表示研究中可以应用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包括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计算机模拟、自动内容分析以及探索性数据可视化等，这些技术连同一些其他技术共同引发了有关人文学科认识论的问题。两位作者探讨了研究基础设施对数字人文发展的重要性，从更宽泛的角度对人文学术的可能性拓展进行了思考。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专为承载、存储、维护和典藏研究及档案材料而建造的物质实体，同时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资源访问活动以及原始资源的变形活动变得丰富多样，这样就催生了新的学术形式。数字方法是指用于描述和处理网络文本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天生数字”的数据的方法。两位作者试图扩大数字方法的覆盖范围，对软件研究和计算机代码研究进行了介绍。软件研究是将计算和数字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将软件作为文本来批判性检查其可供性、内部结构等问题，以及研究软件表现出的特定美学问题。代码研究则可以研究算法如何作用于新闻、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学和艺术作品。数字学术与界面批判探讨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如何展示、出版、可获得和可访问等问题。对界面的批判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路径：一是网络界面风格史，二是将界面作为文本，通过精读和遥读的形式进行批判性研究。最后，两位作者对批判性数字人文的概念以及数字人文在社会领域发生再语境化和再嵌入时涉及的社会科学、经济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同时，批判性数字人文也为数字人文缺少文化批评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法。

本书内容全面、思想深刻。两位作者以批判性视角对数字人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为读者了解数字人文的历史沿革、理论框架轮廓以及数字人文今后的发展前景提供了精当的论述。两位作者在写作时突出展现了数字人文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有意忽略对专业细节的描述，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两位作者通过对语言和论点的精心组织，引导读者参与到对数字人文基本原理的讨论中去，为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探索数字人文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

两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使我们对数字人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本书为多元化、批判性的数字人文学科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宣言，将是一本数字人文领域与社会学、信息科学、数字媒体等相关领域，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优秀读物。

本书翻译的倡导者和牵头人是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晓光教授。该中心是国内第一家数字人文研究机构。王晓光教授从博士后就开始接触数字人文、研究数字人文，利用他的情报学背景，在文化遗产数字图像的知识表示和深度语义标注方面，借助“数字敦煌”项目，在“智慧数据”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此次，他牵头翻译该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成立以后的首个学术成果。

本书的翻译团队是国内数字人文领域崭露头角的一群优秀青年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学校工作，有不同的兴趣，但都钟情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且具有合作精神。他们合作翻译本书也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协作与特色。正是他们的协作和努力，才使读者有机会读到本书的中文版本，能更便捷地了解作者的思想。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交叉的研究领域，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文的内涵将会更加丰富，数字人文研究将更具活力，它将为人文科学研究做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马费成

2019年5月10日 于珞珈山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共识，这是现代社会继信息化转型之后的新一波浪潮，也是信息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与信息化革命相比，数字化浪潮的深度和广度正借助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网络、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的突破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同历史上的惯常一样，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也改变了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理念。

自 2009 年以来，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来，数字人文的论文、著作和研讨会都与日俱增，以数字人文命名的学术机构也陆续浮现。2018 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专门成立了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大数据视域下的数字人文研究”也入选 2018 年度“十大”学术热点，这些标志性事件意味着数字人文在经历过孕育起步期后，正在迈入繁荣发展期。

与西方人文学界比较而言，中国的人文学者对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相关研究项目才陆续出现。此后，尽管人文领域的文献资料数据库建设一直未间断，但是直到 2009 年，数字人文的概念